

中国共产党报刊名称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1919—1956）

——一项基于党报党刊名称数据库的分析

潘祥辉，王学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党报党刊的命名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名称折射了党的新闻理念和革命斗争的历史。统计显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再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前后创办了4800多种党报党刊。这些五花八门的报刊名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话语网络”。对报刊名称数据库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报党刊呈现出不同的命名特征，有着不同的“关键词”。总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命名呈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色彩，名称的构成较为灵活和多元。1949年后，报刊名称的数量减少，多样性消失，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党报党刊基本形成了较为整齐划一的以行政区划或政治界别来命名的报刊体系。党报党刊的名称及其演变既受到政治逻辑的影响，也受到宣传逻辑的支配，呈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特征。

关键词：党报党刊；命名；政治符号；话语实践；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5-0002-12

党报的发展演变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办报活动就与党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连，党报以“发挥功能作用的方式为党的事业服务”^[1]。尤其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由党报的宣传鼓动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2]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党报，便不能有党的存在”^[3]。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再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前后创办了480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的命名可谓五花八门。报刊名称作为报纸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宣传政策，研究党报党刊的命名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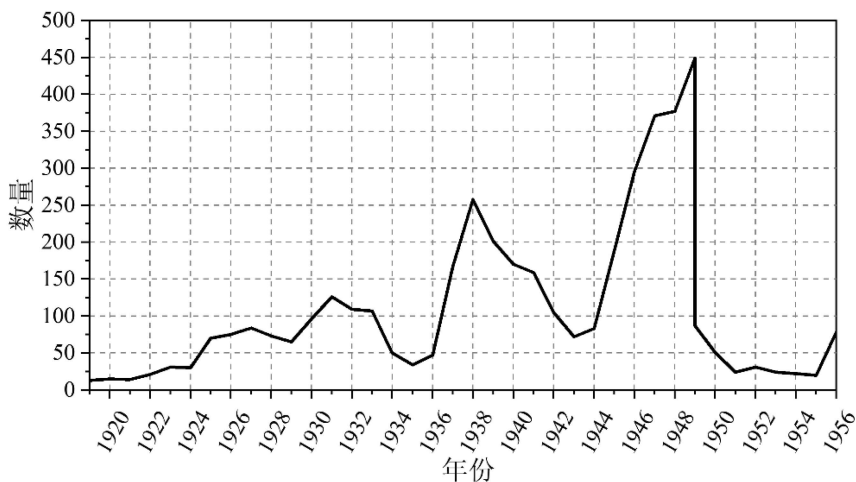
“大多数报纸的创始人都遵循传统模式，使用自报纸诞生之初就在使用的名称，有时只是默认使用。但也有一些报名则是精心挑选出来，以象征一种政治观点、一种哲学或一种被感知的使用。”^[4]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命名有着自己独特的命名逻辑及政治话语。我们曾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命名中的符号景观考察（1919—1949）》一文中具体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命名特征，^[5]但限于篇幅，该文并没有对党报党刊名称的历史演进展开深入讨论，也没有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报刊命名纳入考察范围。为了进一步呈现五四以来党报党刊名称的演变，本文将考察的时间线索延长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并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报刊名称进行词频统计分析，以期呈现党报党刊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命名特点，并探究名称演变背后的机制和规律。

在采集报刊名称的资料来源上，本文参考了相关期刊数据库及前人整理的报刊名录。其中1919—

1949年的名录,参照了钱承军主编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6]、李永璞、林治理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7]及张挺、王海勇编著的《中国红色报刊图史》^[8]等著作,并辅以电子数据库资源如“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等。1949—1956年的报刊名录,我们主要采集自《中国报刊大全(上下)》^[9]分类中的“报纸”及“杂志”,党报党刊的范围涵盖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报、群团类报纸、军队公安民兵报及专业领域中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类的报纸及党建、群团类杂志。人民军队的报刊名录参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报刊史》^[10]等文献资料。综合上述材料,建立了一个包含4891种党报党刊的“报刊名称数据库”,基本上涵盖了从1919年到1956年创办的全部党报党刊。根据这个数据库,本文对中共报刊名称进行了词频统计、趋势分析,力图完整呈现党报党刊的发展演变及命名逻辑。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数量分布

统计显示,自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报党刊数量共4455种(含特刊、纪念刊23种)。其中,大革命时期324种,土地革命时期874种,抗日战争时期1512种,解放战争时期1722种;1949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报党刊的数量为436种。



1919—1956年党报党刊数量分布图^①

可见,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相适应,党报党刊的创办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形成党报党刊历史上的“高峰”与“低谷”。

大革命时期(1919—1927)党报党刊数量处于低位发展期,年均创刊量为39种。不过,1925—1927年出现第一个办报高潮,年创刊量分别为70、75、84种。党的地方报纸,如中共天津地委主办的《工人生活》,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报《中州评论》,中共两广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等均创刊于这一时期。此外,工人、农民、妇女等群团类地方性报刊也是在1925年以后陆续创办。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活动以1924年国共合作为时间节点,呈现“先中央,后地方”的先后顺序,“中国共产党先办中央报刊,使之成为革命舆论的领导者及中坚力量;然后在加强中央报刊的同时创办地方报刊,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报刊网络。党的地方报刊是在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陆续创刊的”^[11]。可以发现,1925年后,党报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形成了中共办报史上的第一个小高潮。

^① 本图排除缺少创刊年份的报刊,实际共计4292种。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党报党刊保持中低速发展，年均创刊量为79种。1931年、1932年、1933年的党报年创刊量均突破百种，分别为126、109、107种。如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实话》《斗争》《党的建设》《瑞金红旗》等各类群团报刊、人民军队报刊均在这几年创刊。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新闻事业一分为二，一是在国统区党报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一是在革命根据地，红色报刊迅猛发展。^[12] 1931年9月，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迎来了中共报刊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至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的三年中，中央根据地迅速创建与发展新闻事业，初步形成了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系统。^{[11] (227)}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党报年均数量保持在155种。1938年创刊量为258种，达到第三次办报高潮。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其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创办起一大批以团结、抗战、民主为宗旨的报刊。1939年后，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使党的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13]，促进了党报数量的飞速增长，形成了以《新中华报》为中心，《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为辅助的中共中央报刊系统。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也创办了一大批抗日救亡报刊，如《救亡日报》《全面抗战》《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1941年后，抗日战争在经济上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华北、华中等敌后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的新闻事业受到严重迫害，年新办报刊数量显著下跌。到1943年、1944年，年创办报刊数量跌至70—80种。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经历了发展、收缩、再发展的历程。抗战胜利初期，在国民党大肆抢占新闻阵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加快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办报进程。在抗战胜利后、内战开始前的短暂间隙，中国共产党党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统计显示，自1945年9月以后，党报年创刊量将近300种，创历史新高。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党的新闻事业转为收缩，许多报刊从城市迁回农村，由大报改为小报。到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重新焕发生机，党报年创刊量持续走高。1947年、1948年、1949年分别为371、376、449种，达历史最高。如《石家庄日报》《内蒙古日报》《吉林日报》等，均于这一时期创办。整体上看，解放战争时期党报年创刊数量保持高位增长，表现为加强军事宣传政策下人民报刊的飞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为适应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系统，发挥党报在全国报纸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实行计划体制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两大改造目标^[14]，党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裁撤、新创。党报数量呈明显的断崖式下降，年均创办量仅为42种，1953—1955年新创报刊数量分别为24、22、20种。改革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闻事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新闻事业系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事业建设的重点。这个国营新闻事业网，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为主体。据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各级党的机关报共151种，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9%。^{[11] (332)} 此外，工会、青年团体及人民军队等报刊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组。报刊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人民军队报刊，从1949年到1956年，根据集中力量办好大军区领导机关报，军队报纸进行了三次压缩，从1951年的1000多种到1955年减少为55种（报纸22种，刊物23种）。^{[10] (278)}

二、斗争与团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命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① 中国共产党报刊成为联系这些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形式。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党报党刊既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也致力于团结各阶级。这一特点鲜明的表现在党报党刊的命名上,可以概括为:灵活多变、机动斗争、联合动员。

(一) 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的报刊命名(1919—1927)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期,也是其登上历史舞台初试锋芒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崛起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在中共的领导下,青年、工人、学生、军人等群众性报刊一时涌现,声势空前。”^[15] 这一特点生动地显现在报刊命名上。词频统计显示,以“青年”“工人”“妇女”“学生”“少年”等人群命名的报刊大量出现。其中,“青年”类报刊出现的次数最多(32次)。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代表新生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最直接的受众群体和动员对象。这一时期的青年报刊有《新青年》《中国青年》《青年工人》《湖南青年》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青年”报刊。作为显著的媒介符号,“青年”兼具象征和隐喻,昭示着革命的启新性。阿伦特认为,年轻人,同时也是新一代,不断地侵扰现状的稳定性。^[16]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进一步揭示了“青年”所具有的“除旧布新”的象征意义;“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17]

工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要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宗旨即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依靠工人、发动工人、教育工人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表现在党报党刊上就是工人报刊异军突起,有29种,如《工人周刊》《湖南工人》《工人教育》等。紧随工人报刊的是“农民”报刊,有15种,如《中国农民》《农民运动》《湖南农民》等,可见农民也是革命重要的依靠力量。

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精神,“妇女解放”仍是重要的时代课题。20世纪初到1919年,“解放”的使用主要在女权领域,即主张女性的解放和妇女改造。1920年后,实现了劳动者解放和女子解放的结合。^[18] 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了妇女组织,也创办了大量的“妇女”报刊(15次),如《劳动与妇女》《中国妇女》《革命妇女》《妇女日报》等。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呼吁:“中国国民革命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万岁!”显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妇女解放已经跳出了社会层面的男女平权,转向政治层面的“阶级”解放,更具有革命性。

以社会阶层命名的报刊显示了党报党刊的重要任务是启发各阶级的觉悟,促进团结,推动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革命”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份上,也体现在不同的地域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地域命名的刊物,除了“中国”(8次)外,主要集中在“上海”(6次)、“湖南”(6次)、“福建”(5次)、“江西”(5次)、“武汉”(4次)等地。这些地方既是革命的中心,也是办报的中心。通过办报,阶级和地区间形成了广泛的联动,构筑了大革命时期的报刊生态和话语形态。

(二) 土地革命时期的报刊命名(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性质和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报党刊名称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表现出更鲜明的阶级性和斗争性。1927年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国共两个政权的对峙格局正式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并外化为党的宣传话语。“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一种有着鲜明特点的崭新的新闻事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创办的党

^① 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2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它不受国统区法西斯新闻统治的压迫，也摆脱了报业资本家追逐私利的束缚。它是人民大众的、自由的新闻事业，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武装起来的苏区人民用以扩大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15](311)} 创刊于1933年7、8月间的《反帝拥苏通讯》就鲜明地体现了当时苏区的政策。“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总方针的同时，提出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这个阶段确定的宣传方针，具有阶级性、号召性特征。”^[19]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围剿与新生政权的内生性压力，党报党刊的命名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号召性与战斗性。

经统计可知，“红旗”是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命名符号，带有“红旗”二字的报刊高达62种，如《红旗》《瑞金红旗》《闽西红旗》《红旗日报》等。“红旗”是党的象征，也是“红军”的象征，代表着革命的方向。“红旗”之外，其他冠名“红色”的报刊还有39种。两者合计达100多种，占据了这一时期报刊名称的绝大多数。“红旗”与“红色”都是革命符号，是人们认识中共政治立场的工具，同时也是构建政治斗争的象征物。^[20]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红”内涵着与“白”区的对立。“红色”报刊的崛起是这一政治斗争形式的外化和象征，体现了党报党刊鲜明的战斗性。

“青年”（32次）仍是高频词汇。但在构成报刊名称时，使用的“青年”符号多饰以修辞，重要的报刊有《赤色青年》《反日青年》《反帝青年》等，其中以《列宁青年》的刊名数量最多，共16种。相较于大革命时期，“青年”所具有的启新隐喻通过“列宁”“无产”“东方”“赤色”等修辞扩展为“阶级斗争”话语，即“争取苏维埃的中国之胜利和世界革命之胜利，以彻底解放青年之苦痛！”^{[6](134)} 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命名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工人”报刊也表现出强烈斗争性。在土地革命时期新出现的38种“工人”报刊，如《工人斗争》《苏区工人》《工农兵》等，均体现出鲜明的苏区特色。

此外，土地革命时期更是通过“斗争”及“战斗”等话语命名党报实现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旗帜鲜明。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红旗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称：“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斗争”及“战斗”命名的刊物有《斗争》《斗争先锋》《战斗生活》《战斗生产》等。“人们对于党报性质的认识，具体化了，深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二是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工农群众的报纸。”^{[15](342)} 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的报刊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报刊的名称上。

（三）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命名（1937—1945）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起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共两党之间的“革命”话语争夺开始让位于抗日战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方，报刊命名集中体现了党的主张。为了宣传抗日，中共创办了大量的“抗战”刊物。刊名中出现的高频词依次是“抗战”（46次）、“抗敌”（36次）、“战斗”（39次）、“抗日”（18次）、“救国”（13次）。这些报刊都是服务于抗日救国的产物，诚如《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指出：“《抗战日报》是晋绥边区六百万人民的报纸，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反映人民生活 and 要求的镜子，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21] 以“抗战”为名的代表性报刊还有《抗战自卫》《抗战建国》《全民抗战》等，以“抗日”为名的有《抗日路线》《抗日先锋》《抗日战场》等，以“救国”为名的有《救国报》《牺牲救国》等。

抗战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众”（32次）和“群众”（24次）是这一时期报刊名称中的高频词，远超“农民”“工人”等群体。可见，以阶级属性命名的报刊在弱化，而模糊阶级属性的“大众”和“群众”则成为抗战的主体。代表性报刊有《大众文化》《战士大众》《新群众》《群众导报》《群众画报》等。这种命名是中国共产党从话语实践出发，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意义，以凝聚认同，营造抗战语境，推动全面抗战。这种命名也体现了党报在当时的任务，即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

宣传和贯彻“全民抗战”的方针政策。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以“文艺”命名的报刊,“文艺”作为团结各方力量的宣传手段,以“文艺”命名党的报刊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宣传”工作的认识和重视。在延安革命根据地,中共设立了一些文艺领导机构和专业社团,仅这些团队创办的文学文艺刊物就有20多种。^{[6](175)}这一时期,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文学艺术家也参与办报。以“文艺”命名的刊物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多达49种,包括《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等。此外,还有一些以其他方式命名的文学艺术类报刊,如《草叶》《谷雨》《诗刊》《边区戏剧》《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文艺报刊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党重要的宣传喉舌。毛泽东在1942年5月2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22]和刊物的创办一道,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也深入到“大街小巷、工厂码头和农村”^[23]。艺术的宣传鼓动功能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报刊命名(1945—1949)

抗战结束后,党的历史任务已从反抗日本侵略者、“救亡图存”,变成了如何与国民党抗争与合作,实现中国的解放,建设一个新中国。因此,抗战一结束,中共就通过创办报刊或改换报刊名称来宣称自己对时局的主张。早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天,即1945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即创办《新生活报》。同年9月1日,改名为《时代日报》。该报广泛宣传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立场、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阴谋和反动统治。1945年10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抗战前的《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虽然《建国日报》只出版了15天,即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但仅这样的报名本身即有力地传播了共产党的声音。^{[15](991)}

1945年以后,“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目标。不同于抗战时期“民族解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以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为目标。1946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报》在北平创刊,由徐特立任社长。《解放报》“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建设成就,揭露美蒋发动内战反共反民主的罪行,并辟有《群众呼声》《读者通信》《问与答》等专栏,发行量高达5万份。^{[15](996)}

“人民”和“群众”也是这一时期报刊命名中的重要关键词。1942年,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24]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体现在报刊命名上,这一时期的“人民”报刊多达40余种。1946年5月16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市创刊,《发刊词》中写道:“本报的出版,在于发扬晋冀鲁豫边区人民驱逐日寇,热爱民族,热爱和平民主的传统精神”“我们的口号是毛主席昭示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本报的方针和宗旨。”^{[15](1059)}据统计,这一时期以“人民日报”命名的报刊有7种之多。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创刊,这份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的《人民日报》也是今天《人民日报》的前身。

除了《人民日报》,“人民”字号的报刊还有《人民呼声》《人民文艺》《人民战士》等。显然,“人民”至上很好地体现了党的办报路线与办报方针。中共报刊向来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媒体也是人民的媒体、党媒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25]。“人民”之所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刊名中的高频词,在于这一时期党、党媒、人民群众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有机统一。

“群众”也是这一时期的高频报刊词。计有《群众报》《群众日报》《群众文艺》等刊物。“群众”刊名鲜明地体现了中共报刊的“群众路线”。“新华”话语成为一个突出的新现象,出现了16种“新华”报刊,如《新华电讯》《新华周报》《新华通讯》等。“民主”成为一个新的报刊词汇。早在抗战

后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力地推动了报刊的变化与前进。一些新的刊物如《民主周刊》等应运而生。^{[15](628)}抗战胜利后,在与国民党的博弈和谈判中,中共提出了联合执政、民主执政的主张,呼吁通过“民主”来解决纷争,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因此“民主”这一关键词也多次出现在报刊名称中,共出现16次,包括《民主日报》《和平民主报》《民主青年》等。这种民主话语是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时代话语。

三、改造与新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命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领导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全国各机关、团体、组织及各个方面的报刊纷纷创刊或复刊,报刊出版获得长足进步。

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1956年诞生的党报党刊共436种,其中中央机关及省市县等机关报刊225种,党建及党的教育类期刊11种,农民青年工人等群团类报刊81种,人民军队及公安民兵类报刊104种,其他专业类报刊15种。仅55种报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党报党刊的合并、改刊的基础上保留下来的,新创报刊为381种,新创率高达87.6%。这些保留的报刊主要为省市地方性机关报,如《大众日报》《陕西日报》《吉林日报》等,是原本地出版的党报改组而成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则沿用了革命时期的命名。

(一) 党报命名话语从多样性走向秩序化和统一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是“四级办报”体制。党报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在业已成熟的“革命”导向的宣传思想和实践基础上,开启了“价值重塑型”宣传思想工作。^[26]表现在党报党刊的命名上,则是从战争年代报刊名称的词形多样、词义多样进入到建设时期的统一化。“日报”是党报最为主要的一种形态,词频达81次。“日报”这一名称的采用体现了中共党报从战时宣传性转向关注新闻的时效性。在革命早期,不论是从中共的政治实力还是革命发展需要看,均难以满足大规模创办日报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报”已经成为党报的专属标签,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转向建设时期的常态化新闻生产。根据日报的级别,又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采用“称谓+日报”的命名格式。从历史发展来看,《人民日报》是由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即《人民日报》的命名是整合改造的结果。从词义内涵来看,经由革命时期的话语实践,“人民”一词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一个政治性的整体,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27]《人民日报》的命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

第二,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区域设置相一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市县机关报基本采用了“地名+日报”的命名格式。在这些地方性机关报中,《内蒙古日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江西日报》《河南日报》《陕西日报》等省级机关报是经由报刊合并兼并而保留下来的,其余报刊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创的。像《张家口日报》《石家庄日报》《大同日报》《包头日报》等地市县报纸,都是由地市县的名称命名的。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这三份省级机关报则沿袭了革命年代的党报名称。

第三,各级群团类报刊采用“职业(阶级)+日报(报)”的命名形式。统计显示,1949年到1956年,农民报为16种,工人报为24种,青年报为15种。较之于1949年以前,尤其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工青妇农类报纸数量明显减少。但在地方层面却出现了一些新创办的报刊,这些报刊在“群团”名称前均添加了行政区划,如《四川工人日报》《浙江工人报》《山西青年报》《湖南妇女报》《吉林农民报》等。与新中国成立前群团类报刊的斗争性修辞相比,地区归属细化了群团报刊的界别,

使群团类报刊具备了地区属性,服务于地方建设。此外,这一时期部分国家统一领导的公有制行业也创立了地区性的党报,如《山东邮电报》《江苏邮电报》等。这种命名形式亦遵循统一的格式,有利于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发挥党的宣传作用。随着各建设专业分工细化,以各种工种命名的党报也应运而生,如《冶金报》《陕西建筑报》《铁道工人报》《武钢工人报》等,充分发挥了党报在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总体来看,通过这种党报命名程式,形成了党报体系的统一格局,有利于统一领导,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宣传格局。

(二) 党报命名话语内涵从斗争转向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党的新闻事业从战时的革命宣传转向了建设宣传。根据1950年4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要求,“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28]。党报的名称也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斗争性话语转向了建设性话语。

1949年后的党报党刊命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去革命化”。195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全国的报纸工作在最近几年内在各种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已成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联系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29]从内涵上,党报的名称符号经过了革命时期的洗礼,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内涵,如上文提到的“人民”“解放”“新华”“大众”都指向新的政权形式。像《新儿童》《少先队员》《红领巾》《好孩子》等报刊通过突出青少年的朝气,代表着希望和未来。同时群团类报刊从具有极强阶级性色彩的《无产青年》《反帝青年》,转向地域性的《四川青年》《贵州青年》《河南工人》《福建工人》等以服务地方建设和发展为特色。而“生活”(21次)作为党报党刊命名的高频词,已经发展成为各地区综合性党报报刊的代名词。如各地创办的《支部生活》刊物,《支部生活》(上海),《支部生活》(山东),以及《党的生活》(河南),《党的生活》(青海)等以教育、团结党员为主,体现了党报党刊转向党的建设、党员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边疆民族地区也创办了大量的党报,以服务于当地的建设工作。到1956年,内蒙古、西藏、新疆已实现了党报的多民族语言出版。如《内蒙古日报(蒙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新疆日报(哈文版)》《新疆日报(蒙文版)》《新疆日报(维文版)》《团结报(傣文版)》《团结报(景颇文版)》《甘南报(藏文版)》《伊犁日报(哈文版)》等,这些党报的命名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团结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基于行政区划的党报命名,也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归属感,有利于在边疆地区建立党的合法性,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目标服务。

四、为政治宣传服务:中国共产党报刊命名的机制与逻辑

报刊命名与报纸的历史一样久远。通过命名,可以明确报纸的所有权及保证出版内容的连续性。^{[4](3-4)}近代以来,中国的报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命名传统,将“报”作为命名的后缀明确报刊的性质,如“时报”“日报”“报”“画报”等。或以登载内容的地域命名,如诞生于中国近代第一次出版高潮时期的《中华民国公报》《中原报》《汉民日报》《山西民报》。^[30]或以办报的目标和导向命名,如《人权报》《民心报》《民意报》等。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命名方式,在保留传统命名格式基础上,还有其独特的逻辑和政治表述。这些政治话语及表述诞生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体现了政治政党寻求制度合法性、争夺意识形态符号、塑造人民政治想象的政治逻辑。

党报党刊及其名称符号共同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实践，故其背后亦蕴含着党的宣传逻辑。1949年后，随着党政合一体制的建立，行政治理的科层体制成为制约党报定名的新逻辑。

（一）政治逻辑主导着党报党刊的命名

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可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和由权力关系所构成的集体性实体。^[31] 中国共产党在“办报建党”的实践下，党报的名称从一开始就是党组织的话语代言人，宣示党的工作重心、标识党的组织。“为党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政治逻辑支配着党报的命名。一方面，党报党刊的名称是在党性原则下服务于党的建设、党的组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党报的名称以鲜明的斗争话语回应了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军事斗争的需求。

1. 党报命名的组织逻辑

中国共产党“办报建党”的实践渊源和理论根植于马列丰富多彩的报刊实践，特别是列宁的“办报建党”的理论与实践，组织“着手建立和巩固党的机关报，就是建立和巩固党本身”^[32]。早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的报刊就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9月15日创办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就是“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33]。印这个报，就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34]。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效法上海《劳动界》创办的《劳动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都旨在引导“劳动者”提升阶级自觉性，团结起来改造社会，为建党做准备。直到1920年11月7日，党内第一份政治理论机关报《共产党》创办，象征着党组织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树起“共产党”旗帜，是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35]。

服务于党的组织建设也是党报党性原则的要求。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决议提出：“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等。”^[36] 决议还指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因此，党报党刊的政治传播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宣示党的宗旨、传达党的政策、沟通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信息，以及对党员群体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功能。在这种情形下，党报党刊的媒介与传播功能与党的文件的传播功能十分类似，很多情况下两者甚至可以等同。因此，党报党刊与党的组织机构共用一个名称。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组织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此同时，创立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该刊对于推动工人运动及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而1923年10月20日创刊的《中国青年》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927年10月10日停刊），其目的在于领导和团结青年群体。

2. 党报命名的斗争逻辑

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主导着报刊的命名。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的实践和论述看，新闻宣传的具体任务主要是：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报道评论国内外时事真相，廓清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和先进文化思想，批评各种错误思想主张。^[37] 革命斗争及其赋予党报党刊“笔战与舌战”的职能，使得党报党刊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党报党刊的名称就深植于这种战斗性中，以直露的话语表达战斗、反抗、革命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话语链或话语的秩序是通过“互文”将其他的、特定的文本明确纳入到一个文本之中。^[38] 将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命名作为一个整体文本时，很容易发现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的命名展现出了鲜明的战斗性色彩。例如，1932年1月21日创刊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机关刊就叫《斗争》，1932年创刊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机关报叫《战斗报》等。到了抗战时期，“战斗报”数量增多，如1940年春创刊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二地委机关报也叫《战斗报》（同年夏天改名《阵地报》），中国共产党晋冀豫省委于1943年6月1日也创办了《战斗》。1938年6月7日创刊的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长治中心区机关报则叫《战斗日报》。这种“战斗—抗战”的党报党刊命名话语谱系，体现了党报的阶级

性和斗争功能,和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报刊温文尔雅或标榜“客观性”的表达方式全然不同。“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是对共产党革命的生动概括,报刊就是另一种“枪弹”和“武器”。报刊命名作为一种标识,也反过来有力地彰显了这种斗争精神,并服务于党的革命斗争。

(二) 宣传逻辑主导着党报党刊的命名

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力量。因此,宣传、鼓动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党的事业中,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开展的工作。党报党刊就扮演着宣传者和鼓动者的重要角色。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党报命名具有标识宣传任务、宣传主体、宣传对象等功能,以服务于党的宣传鼓动和革命斗争需求。

1. 党报命名的宣传导向和行动逻辑

从名称的词性来看,党报党刊的名称以动词为主。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动词为主的命名形式在宣示报纸主旨的同时,也体现了强烈的能动性。如中央苏区中央局最早的机关报名为《战斗》,后定名为《斗争》。《前进》则是土地革命时期党指导闽西青年运动所创办的刊物。《前进》这一刊名的含义正如第一期《发刊词》中所言:“他是强有力的革命领导者,他要执行上列的任务,与一般同志共同创造更广大的光明世界。”^{[8](70-71)}《团结报》是“皖南事变”后中共闽西南特委的机关报。“团结”二字具有明确的指向和动员效果。动词刊名体现了党报党刊强烈的干预现实、干预政治以及干预思想的功能。动词主导的报名也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宣传鼓动的特性。

2. 党报命名的人民导向及宣传动员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其需要团结群众、动员群众。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言:“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5](338)}早在建党之初,“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中共革命的口号,也是中共报刊的宣传宗旨。从报刊名称来看,不论在革命的哪个历史阶段,“人民群众”都是报刊命名中的高频词,包括相当一部分以“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类别命名的报刊。仅以画报为例,据统计,在90多种画报中,“人民画报”名称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39]这些报刊以“人民群众”命名,顾名思义,是为了宣示它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或者报刊的宗旨是为了团结人民群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国家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0]。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了集体认同的主观面向,另一方面也论述了国家话语形式的“同一性”。中国共产党将复杂多元的社会力量(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聚合于“人民”政治话语之下,为建立共同体的政权形式提供了书写的“统一性”。

从办报主体来看,“群众”与“大众”报刊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从1946年夏秋到1948年夏,为配合“土改”,解放区的报纸大力支持群众斗争,为群众讲话,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广大农民群众反映“报纸是咱们的指导员”“咱们报成了土改报了”^{[15](1114)},群众报刊的宣传鼓动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 组织科层制主导着党报党刊的命名

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于严峻的革命实践之中,适应革命形势,中共形成了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传统。这也是党报党刊在革命年代命名呈现出以人民为主体,多样性、灵活性的命名特征的重要原因。随着党的政权体系的建立,为进一步明确读者对象、宣传重点,发挥党报的政治和宣传作用,逐渐建立起了层级分明的报刊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党报的命名表现出明显的科层制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的命名就体现出党组织的科层制特征。但由于当时党中央的刊物往往没有“中央”二字,科层制不明显。到延安时期,在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延安出版业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同时,各敌后根据地出现了创办小型报刊的高潮。“但由于大部分报刊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创办的,

相互之间没有定位、读者对象、宣传重点等方面的合理安排,因此分工不明、力量分散;加之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报刊的政治表现和宣传水平得不到保证。”^[4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9年5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指示》要求“从中央局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且规定“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42]。在这一指示的影响下,各根据地集中力量创办各级党委机关报,党报的命名表现出明显的科层制特征。如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边区群众报》,后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晋察冀中央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晋绥根据地的《晋绥日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新华日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的《大众日报》后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科层制报刊体系的确立既实现了党报与党报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又在等级制度原则下,建构了党报的合法权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依科层制整合报刊、进行命名的做法就更加明显了。在继承与发展的双重逻辑下,新时期党报命名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层制命名结构。经过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组建起以中国共产党党报为核心的四级报刊。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即《人民日报》;第二个层次是大行政区的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设有六大行政区;第三个层次是省委党委的机关报,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第四个层次是地(市)级党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创办的机关报。^{[41](228-229)}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党报体系。在科层制政府系统下,建立了科层制政党传播体系。通过层级分明的党报定名,政治信息实现了在各个层次的政府和单位之间的有序流通。

五、结 语

“报刊的名字,就像报道的准确性和编辑政策的倾向一样,是报纸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43](4)}丰富多彩的、独具特色的中共报刊命名呈现了报刊演进的历史,也呈现了其背后的政治与宣传逻辑。可以说,不论是在“办报以建党”政治逻辑主导下的党报命名,还是在宣传动员逻辑支配下的报刊命名,抑或是服从行政层级制度下的报刊命名,中共报刊的命名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性、政治性和宣传性等特征,而其明确的政党属性、阶级属性则一以贯之。

党报党刊的命名是党在宣传动员理念下建构的重要媒介现象。传播载体不只是信息或叙事,命名本身也是传播的重要载体。党报党刊的名称搭载报刊实现了最广泛的传播,成为宣传的锐利武器。尤其是在革命年代,在党的舆论观、宣传观的指引下,党报党刊的名称以旗帜鲜明、灵活多变、浅显易懂的话语叙事起到了信息传播、革命动员的重要作用。进入建设时期,党报党刊的名称成为建构党的报刊的话语秩序的重要载体,通过统一的命名程式,服务于政党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

党报党刊的命名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宣传武器,到建设时期的喉舌工具的转变。党报党刊从历史中走来,其名称符号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时代主旋律”。党在不同时期的纲领、政策及政治目标,都鲜明地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党报党刊的命名上。党报的命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的。作为一个标识,党报党刊的名称和党刊党报融为一体,发挥着干预现实、改造现实、建构现实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报党刊命名的历史及其名称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共报刊新闻事业的发展史。

参考文献:

- [1] 杨保军.论当代中国“党媒”理论体系的构建[J].新闻界,2021(1):16-2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文章选编(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417-418.
- [3] 立三.党报[N].红旗,1930-5-10.

- [4] Bernhard, J. (2007). *Porcupine, picayune, & post: How newspapers get their nam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5] 潘祥辉, 王学敏. 中国共产党报刊命名中的符号景观考察 (1919—1949) [J]. 新闻大学, 2022 (12): 1-14+121.
- [6] 钱承军.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3.
- [7] 李永璞, 林治理. 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 (1919—1949)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77-85.
- [8] 傅柒生. 红色记忆 中央苏区报刊图史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55-60.
- [9] 《中国报刊大全》编辑部. 中国报刊大全 [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6: 99-108.
- [10] 黄河, 张之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报刊史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1.
- [11] 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05.
- [12] 方晓红. 中国新闻史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04-205.
- [13]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49.
- [14] 张济顺. 远去的都市: 1950年代的上海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44.
- [15]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2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121.
- [16] [美] 汉娜·阿伦特. 论革命 [M]. 陈周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18.
- [17] 陈独秀. 敬告青年 [N]. 青年杂志, 19151 (1): 1.
- [18] 袁光锋. “解放”与“翻身”: 政治话语的传播与观念的形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 (5): 44-59+126-127.
- [19] 刘云, 吴水弟. 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4.
- [20] [美] 林亨特.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M]. 汪珍珠,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0.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135.
-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47.
- [23] 林之达.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113, 141, 161.
- [2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 90.
- [25] 朱清河, 王青. “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历史缘起与逻辑勾连 [J]. 国际新闻界, 2021 (5): 142-157.
- [26] 李宗建.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研究 [D]. 南开大学, 2013.
- [27] 李冉, 邹汉阳. 党性、人民性的话语起源与行动逻辑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 (5): 38-44.
- [28]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1996: 61.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中) (1950-1956)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319.
- [30] 叶再生. 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 (第二卷)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2: 1-17.
- [31]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M]. 殷晓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62.
- [32] 童兵.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232-234.
- [33] 《劳动界》出版告白 [N]. 民国日报, 1920-8-17.
- [34] 汉俊.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 [N]. 劳动界 (第一册), 1920-8-15.
- [35] 顾海良, 丁俊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31.
- [36] 一大回忆录 [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0: 55.
- [37] 郑保卫.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29.
- [38] 韩素梅. 国家话语、国家认同及媒介空间——以《人民日报》玉树地震报道为例 [J]. 国际新闻界, 2011 (1): 48-53.
- [39] 吴果中, 刘晗. 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人民本位”的视觉体系——由多种《人民画报》的命名所引起 [J]. 出版发行研究, 2021 (10): 100-106.
- [40] [美]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睿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
- [41] 吴廷俊. 中国新闻事业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221.
- [42] 周勇.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 108.